

#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學生姓名：陳翠君 CHAN CHOI KUAN

論文選題：《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評選柳文研究

指導老師：余歷雄 博士

呈交日期：2016 年 08 月 19 日

#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 《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評選

### 柳文研究

科目編號： ULSZ 3078

學生姓名： 陳翠君

學位名稱： 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 余歷雄 博士

呈交日期： 2016 年 8 月 19 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 目次

摘要.....	i
致謝.....	ii
第一章 緒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選題意義.....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資料範圍.....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預設成果.....	5
第二章 《古文淵鑒》、《唐宋文醇》與清初評點文學概述.....	7
第二節 《古文淵鑒》的選本意義.....	7
第二節 《唐宋文醇》的選本意義.....	10
第三章 《古文淵鑒》柳文評點芻議.....	12
第一節 社會歷史批評下之柳文.....	13
第二節 官方意識下之柳文.....	17
第四章 《唐宋文醇》柳文評點芻議.....	23
第一節 柳文比較——選本之上承《古文淵鑒》.....	23
第二節 官方意識之突進——帝王意識與義理闡釋下之柳文.....	27
第三節 餘論——對桐城派文論之影響、對柳宗元之評價.....	30
結論.....	32
參考書目.....	33

# 《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評選

## 柳文研究

##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是論文中引用他人資料、著作亦或者參考文獻，不論是電子、書面文字或是口頭資料，都將具體寫明出處，并仔細列出相關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 12ALB03730

日期：

## 摘要

《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乃是清初朝廷所御製之古文選本。《古文淵鑒》作於康熙時期，《唐宋文醇》則作於乾隆時期。作為清初統治者欽定之選本，其與普遍士人所編選之選本必定有從根本上不同之處。論文將以柳宗元古文作為切入點，分析兩部選本對柳宗元文章之評價、其文學主張及選本之真實意涵。並且結合時代背景因素，探討選本之時代意義。

關鍵詞：《古文淵鑒》、《唐宋文醇》、柳宗元文章

## 致謝

在撰寫畢業論文的整個過程裡，我最感激之人莫過於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余歷雄余老師。不管是論文選題，抑或大綱設置，余老師都給予我很大的幫助與啟發。在過去沉浮於著書、論文，資料、文獻的日子裡，我惶惶不知終日。曾經深感即使翻閱再多資料，也無法理清思路，對我論文究竟是何副模樣，也一直無法歸納出一個完整圖景。這段艱辛的路途，若非余老師從中指點，不斷替我把多餘的雜念，暫時派不上用場的觀點一一斬落，這論文也無法順利寫下去。在此非常感激余老師花了諸般心力、時間，在撰寫論文的這段時間，栽培我以及鼓勵我，使我在學習、學術的道路上，獲益良多。

接著，也乘機感激我的父母，在各個方面提供了幫助、配合以及體諒。這段時間裡我陪伴家人的時間相對地減少了許多，學期末假期也幾乎沒有回家。在此我想向父母表達歉意，並且承諾畢業以後，會多處在家裡替父母親分擔家事，陪二老一起渡過很多平凡的日子。我真的感到萬分慶幸，一直以來父母親並未對我施壓，不管在學業的哪一方面，都任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在此，謝謝我至愛的父母親對我的包容以及溺愛。

同時，也要感激我在雙溪龍唸書的弟弟。他在我實習期間總是不遺餘力地替我還書、借書，往圖書館處奔波。在此感激他慷慨幫助。除此，也要感激我的好友以及同學們，在這段時間裡給予我鼓勵和支持。最後，當然也要謝謝自己在這段時間裡的努力以及堅持，最終才得以把這份畢業論文完成。

## 第一章 緒言

選本是總集的其中一個類別<sup>1</sup>，其屬於評點文學，是文學批評的形式之一<sup>2</sup>。選本與其他文學批評專著如論文、詩話、文話、書札不同，選本的組成除了評點，還有序跋與文學作品。此三者的結合，才勾勒出選本完整的批評意識、文學理論。在選本的評點機制中，序跋記錄了選家之文學思想、選錄範圍、選錄標準、編選原因等，是為選本之“綱”；而選本所選之作品則是“目”，如何選、選什麼，全受“綱”之統領。（方志紅，2008:31）接著才到評點，選家依著所秉持的文學批評理念針對各篇作品作出解析和評價。故此，選本乃是批評理論和批評實踐之結合<sup>3</sup>。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選題意義

在選本的編選上，清初學界延續前朝之繁榮，紛紛透過選本發表自己的文學主張。其中，出現了過去文壇少有之現象——當朝統治者也加入了評點文學之浪潮中，下令御選文集，甚至自己也參與了御選的工作。在文學批評的歷史上，這可說是絕無僅有。當然，統治者涉足文學領域，往往不是出於單純的學術理由，而是有其政治目的，這是無論如何都無可否認。但撇開政治因素不論，兩部選本難道就毫無可取之處了嗎？2011年揚州大學王亞楠，其碩士學位論文——〈《古文淵鑒》研究〉曰：

“這些評語（指《御製古文淵鑒》）言簡意賅、全面深刻，從中可以抽繹出清初官方苦心孤詣扭轉明代後期文風、士風和學風的文化文學等方面導向

---

<sup>1</sup> “選本”，即指總集中之選集。詳見鄧建（2009），〈中國古代文學“選本”之釐定與辨析〉，《理論界》，2009年11期，頁144-145。

<sup>2</sup> 詳見孫琴安（1999），《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緒論頁1-13。

<sup>3</sup> 詳見王兵（2010），〈論古代文學選本的批評機制和理論價值〉，《鞍山師範學院學報》，第12卷第3期，頁65-69。



的豐富內容，對於研究明清之際文學文化變遷情況和清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走向與動因，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王亞楠 B，2011:1-2）

我認為王亞楠的這番見解是非常獨到且辯證的。

《御製古文淵鑒》（以下簡稱《古文淵鑒》）和《御製唐宋文選》（以下簡稱《唐宋文醇》）為清初時期官方欽定的古文選本。兩部選本的編選不僅確立了古文在整個清朝之“清真雅正”<sup>4</sup>文風，而且在朝廷幾度頒發至全國，以古文寫作標準用書之名流傳於學界後，其對文壇、文人的影響亦不同凡響。後出的桐城派文論得以發揚光大，賴於兩部御製選本預先助其將與之相似的文論傳播至全國，打下根基<sup>5</sup>。然而學術界卻極少留意到這一層聯繫，普遍認為兩部選本僅是宣傳正統思想之書，而始終漠然以對。迄今，這兩部選本的研究成果仍非常少。

在這三年的本科生涯，對於古典文學，我主要涉獵與關注乃是韓柳作品。而兩位古文大家中，又以柳宗元文章更為看重。一次在閱讀高海夫所編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柳州文鈔》<sup>6</sup>，注意到在眾多評點者中，其中兩位身份較為特殊，他們都是清初帝王，即以上所提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頓時，興趣油然而生，萌生了“清初統治者如何看待古文大家”之問題意識。最終，決定以兩部選本作為媒介，探討其對柳宗元之選、評，以一窺清初統治者對柳宗元其人以及其文的評價，開拓柳宗元研究的嶄新視角。另一方面，本文也借着

---

<sup>4</sup> 詳見高明揚、李洪良（2012），〈清代“清真雅正”審美風尚述略〉，《山西師大學報》，2012年5月，第39卷第3期，頁90-94。

<sup>5</sup> 詳見孟偉（2005），〈清代敕修文章選本及其對文風建設的意義〉，《社會科學家》，2005年11月，第6期，頁28-31。

<sup>6</sup> 高海夫（1998），《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柳州文鈔》，陝西：三秦出版社。

柳宗元選、評的解析，看兩部選本的文學與批評意義、其政治目的、嘗試借柳宗元文章傳達的訊息，以及最後其所帶來的影響。

##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資料範圍

目前學術界對於《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的文學批評研究僅限於論文，而無任何專書。兩部選本相比，又以《古文淵鑒》之專論為多。當中有王亞楠的〈《古文淵鑒》研究〉<sup>7</sup>、〈《古文淵鑒》編撰理念論述〉<sup>8</sup>、〈《古文淵鑒》評點意向與影響芻論〉<sup>9</sup>以及鄭凱歌的〈論《古文淵鑒》體制“權輿于六籍”〉<sup>10</sup>。至於《唐宋文醇》則無任何專論，而有與《古文淵鑒》以及其他選本之合論，如孟偉的〈清代敕修文章選本及其對文風建設的意義〉<sup>11</sup>、〈清代古文選本的編選、評點及其文學批評意義〉<sup>12</sup>以及陸德海的〈從御選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轉變〉<sup>13</sup>。

柳宗元散文研究一直以來都備受學術界的關注。其研究成果不乏各種論著。其中收錄成書就有由韓文綺和尹占華校注的《柳宗元集校注》<sup>14</sup>、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柳河東集》<sup>15</sup>、章士釗的《柳文指要》<sup>16</sup>、吳文治整理的《柳宗元資料

<sup>7</sup> 王亞楠（2011），〈《古文淵鑒》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鄭州大學。

<sup>8</sup> 王亞楠（2011），〈《古文淵鑒》編撰理念論述〉，《語文知識》，2011年第四期，頁12-14。

<sup>9</sup> 王亞楠（2013），〈《古文淵鑒》評點意向與影響芻論〉，《鄭州大學學報》，2013年11月，第46卷第6期，頁109-112。

<sup>10</sup> 鄭凱歌（2014），〈論《古文淵鑒》體制“權輿于六籍”〉，《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9卷第11期，頁80-84。

<sup>11</sup> 孟偉（2005），〈清代敕修文章選本及其對文風建設的意義〉，《社會科學家》，2005年11月，第6期，頁28-31。

<sup>12</sup> 孟偉（2015），〈清代古文選本的編選、評點及其文學批評意義〉，《北方論叢》，2015年第1期，頁42-47。

<sup>13</sup> 陸德海（2010），〈從御選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轉變〉，《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第四期。

<sup>14</sup> 柳宗元撰，韓文綺、尹占華校注（2013），《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sup>15</sup> 柳宗元撰（2008），《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sup>16</sup> 章士釗（2000），《柳文指要》，上海：文匯出版社。

彙》<sup>17</sup>、《柳宗元大辭典》<sup>18</sup>、《柳宗元年譜》<sup>19</sup>、《柳宗元簡論》<sup>20</sup>以及《柳宗元評傳》<sup>21</sup>。除此，還有羅聯添《柳宗元事跡系年》<sup>22</sup>、行嚴的《柳文探微》<sup>23</sup>、孫昌武《柳宗元傳論》<sup>24</sup>、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譜》<sup>25</sup>、段醒民的《劉子厚寓言文學探微》<sup>26</sup>、汪乃珍的《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sup>27</sup>、何樹置的《柳宗元研究》<sup>28</sup>等等。接著，也有各種論文集，如柳州市柳宗元學術研究會所編的《柳宗元研究文集》<sup>29</sup>、梁超然、謝漢強所編的《國際柳宗元研究擷英·93 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sup>30</sup>、陳瓊光主編的《柳州柳學研究文集》<sup>31</sup>、孫昌武和陳瓊光所編的《柳宗元研究文集——第三屆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研究論文擷英》<sup>32</sup>以及蔡自新主編的《柳宗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sup>33</sup>等等。

至於論文方面，則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可觀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梁松成的〈柳宗元永州山水文章明版述異〉<sup>34</sup>、楊再喜的〈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sup>35</sup>、莫軍苗的〈宋代批評視野中的柳宗元〉<sup>36</sup>、莫山洪的〈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

---

<sup>17</sup>吳文治（2004），《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sup>18</sup>吳文治（2004），《柳宗元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

<sup>19</sup>吳文治（1962），《柳宗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sup>20</sup>吳文治（1979），《柳宗元簡論》，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sup>21</sup>吳文治（1962），《柳宗元評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sup>22</sup>羅聯添（1981），《柳宗元事跡暨資料類編》，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會。

<sup>23</sup>行嚴（1981），《柳文探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sup>24</sup>孫昌武（1982），《柳宗元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sup>25</sup>施子愉（1958），《柳宗元年譜》，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sup>26</sup>段醒民（1978），《劉子厚寓言文學探微》，台北：文津出版社。

<sup>27</sup>汪乃珍（1991），《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sup>28</sup>何書置（1994），《柳宗元研究》，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

<sup>29</sup>柳州市柳宗元學術研究會編（1993），《柳宗元研究文集》，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

<sup>30</sup>梁超然、謝漢強（1994），《國際柳宗元研究擷英·93 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

<sup>31</sup>陳瓊光（2004），《柳州柳學研究文集》，合肥：黃山書社。

<sup>32</sup>孫昌武、陳瓊光（2005），《柳宗元研究文集——第三屆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研究論文擷英》，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

<sup>33</sup>蔡自新（2011），《柳宗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sup>34</sup>梁松成（2005），〈柳宗元永州山水文章明版述異〉，《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9月，第26卷第9期，頁47-49。

<sup>35</sup>楊再喜（2007），〈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未出版博士論文，蘇州大學，蘇州。

<sup>36</sup>莫軍苗（2008），〈宋代批評視野中的柳宗元〉，未出版碩士論文，廣州師範大學，廣州。

接受)<sup>37</sup>、劉旭的〈柳宗元寓言芻論〉<sup>38</sup>、師東斌的〈柳宗元記體文研究〉<sup>39</sup>、李雲的〈柳宗元山水遊記創作淵源論〉<sup>40</sup>、徐麗敏的〈柳宗元書啟文研究〉<sup>41</sup>、袁茹的〈柳宗元學術研究與散文創作〉<sup>42</sup>、楊靜榮的〈柳宗元傳記文學敘事研究〉<sup>43</sup>、劉文海的〈柳宗元論說散文研究〉<sup>44</sup>、袁青青的〈《柳宗元》墓祭文研究〉<sup>45</sup>等等。

本論文的資料範圍，主要來自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柳州文鈔》、高海夫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柳州文鈔》、《古文淵鑿》以及《唐宋文醇》。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預設成果

本文主要通過研究《古文淵鑿》與《唐宋文醇》對柳宗元文章（以下簡稱柳文）之選、評標準和規律，一探選本如何將其文學主張與批評意識實現於選文過程與評點之中。以此得出選本對柳文的評價，再探究此種評價背後究竟隱藏何種深意。此種深意從何而來，最終又帶出了何種影響，正是本論文嘗試解決之問題。

雖說，從序跋亦能一覽選本之文學主張及其編選意義，然若要徹底地了解這種選本的文學主張，則必須深入選、評之中。如此，才能斷定該文學主張是

---

<sup>37</sup> 莫山洪（2013），〈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欽州學院學報，2013年1月，第28卷第1期，頁19-24。

<sup>38</sup> 劉旭（2006），〈柳宗元寓言芻論〉，未出版碩士論文，東北師範大學，東北。

<sup>39</sup> 師東斌（2009），〈柳宗元記文體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西北師範大學，西北。

<sup>40</sup> 李雲（2011），〈柳宗元山水遊記創作淵源論〉，未出版碩士論文，內蒙古師範大學，內蒙古。

<sup>41</sup> 徐麗敏（2007），〈柳宗元書啟文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福建。

<sup>42</sup> 袁茹（2005），〈柳宗元的學術研究與散文創作〉，未出版碩士論文，安徽師範大學，安徽。

<sup>43</sup> 楊靜榮（2015），〈柳宗元傳記文學敘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雲南大學，雲南。

<sup>44</sup> 劉文海（2015），〈柳宗元論說散文體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福建。

<sup>45</sup> 袁青青（2014），〈《柳宗元集》墓祭文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陝西。

否實現與選、評之中，以及其具體處理得如何，裡頭是否也隱含弦外之音。而在柳文的評點裡，編選人又是如何借文章的觀點加以發揮，以達到自己的編撰目的。

本文第二章乃是選本之簡介以及其序跋研究。通過理清選本的時代背景，以明確選本之編選意識。接著，再對序跋進行分析和研究，一一勾勒出編選者的文學意識和編選目的。第三、四章則是選本對柳文選、評分析。這兩章都運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分別找出其選、評模式，結合選本的編撰意義、時代背景，來總結選本內的柳文面貌。過後，再探討在編選者眼中的柳文，以什麼何種意義出現在選本裡。最後比較柳文面貌在選本中之異同，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本論文擬以通過以上研究方法，一探兩部選本內之柳文面貌，並總結出兩部之繼承關係，以及其在文壇承上啟下的意義。

## 第二章 《古文淵鑿》、《唐宋文醇》與清初評點文學概述

清初時期，學術界一改前朝陽明學派“空疏不學”的思潮，重新鼓吹儒家學說。“返本歸經”之學興起，仕人以復古為尚。學者將明亡歸咎於理學家空談誤國，極力要求“實學”而非“心學”，當時文學批評也同步響應這項文化巨變<sup>46</sup>。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特征，大抵是“重視文學的時代意義、社會作用，強調詩文經世致用的目的和提倡批判現實的精神”（鄔國平、王鎮遠，1995：緒論2-3）這導致“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差不多成為一半學者所持守之信條”（郭紹虞，1961:6）

明清更迭之際的學術思潮如是，而在帝王有意推動下，更是形成了當朝特有之學風。康熙為一名崇儒重道，推崇孔孟程朱的帝王，極力“將理學向經世致用的實學方面引導”（孟昭信 2006:244），講求“學用一致”、“知行統一”，此舉最終奠定了清初以儒學、程朱理學作為主要文化思想的根基。直到乾隆時期，這種思想不僅僅在學術上取得正統地位，更滲入到了文風、學風之中。

### 第二節 《古文淵鑿》的選本意義

《古文淵鑿》乃是康熙皇帝於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御選、徐乾學為首的十二名大臣編注，歷史二十餘年才完成的古文選本。所收之古文上起先秦下至宋朝，全書曾多達一一四卷。徐乾學《憺園文集》之〈《御製古文淵鑿》凡例〉曰：“（全書）分為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卷、外集八卷”（《續修四庫全

---

<sup>46</sup> 詳見蔡鎮楚（2005），《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頁 319-323。

書》編纂委員會編，2002:768）。然而現存四庫版本僅剩正集六十四卷，餘下別集、外集以及十六卷正集全已不知所蹤，其中原因不明。這六十四卷《古文淵鑿》中，共收入了三九六名作者、1371 篇古文。這裡古文並非相對時文而言之古文，而是指歷代之文章，其中也包括了駢文。選本之古文每篇皆有康熙之眉批，以給予一次總體性評價，接著乃是選臣之評點，以及前人評點以作補充<sup>47</sup>。同時，古文裡也附上注釋，以供讀者便於解讀。

《古文淵鑿·序》以“代不乏人，著作即富，篇什遂繁，不有所屬哀輯，慮無以觀其備；不有所詮釋，慮無義得其精也”（徐乾學等編注，2005:423-1）之理由編選而成，即為了整理歷代古文，以供後人參讀。這乃是康熙在清人初定江山後，為弘揚文治所採取之措施——整理典籍、文學作品。當時，康熙採取此文化政策只為了確立一種“返經歸本”之正統思想。選本序文裡曰“夫經緯天地之為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論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說明文章需能達致經世致用之目的，其意涵要深遠、廣闊，甚至跨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最後實現教化人民，治國平天下之功能。此處特別強調文章之實用性，正是符合了當時“實學”之文化風氣。

接著，序裡又提到這種“經緯天地”之文章，其源大抵“靡不根柢于群經，權輿于六籍”，并一一列出各文體源於何種儒家典籍，如論說文出自《易》、啟奏文出自《書》、賦頌出自《詩》等等。如此推其源流，使儒學在文章發展中看似佔有重要的地位。此種處理方式，乃是為了提倡“返本歸經”之目的。而

---

<sup>47</sup> 按王亞楠〈《古文淵鑿》編選理念述論〉：“《古文淵鑿》所錄批語作者共 132 人，根據其時代和化身，可分為三組：古代學者文士，共 119 人，批語共 1045 條；參與編選和批點的十二位大臣，即徐乾學、陳廷敬、王鴻緒、高士奇、韓葵、張英、宋德宜、吳正治、翁叔元、勵杜納、王熙和孫岳頌，批語共 1096 條；康熙皇帝所選批語，每篇文章各一條，全書批語共 1391 條。”（頁 12）

此又恰是符合了當時之思想潮流。徐乾學在〈御選古文淵鑒後序〉一文裡提到：“皇上神明天縱，尤禪心於致知格物之學，本源而及流體，道以盡器，多識蓄德，衡量在心，故以之討論今古，洞若觀後”（《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2002：551）說明了康熙皇帝對程朱理學之看重，並且將之貫徹於對歷史事件或時事的看法之中。康熙皇帝如此崇儒重道，並且不遺餘力地提倡宋明理學，將之套入選本的編選裡頭。一旦經過朝廷的推廣，由此便確立了一種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的政治意識形態。

《古文淵鑒》是通代式之編選體制。康熙認為，文章發展的歷史一脈相承，絕不可依朝代分開來看。《文選》、《文萃》以及《文鑒》等名著雖在學界十分轟動，卻難以看出文章發展之歷史痕跡。故康熙御製《古文淵鑒》採以通代編選，是以彰顯文章之發展流變，選本可謂是歷代古文之集大成者<sup>48</sup>。至於選本的選文標準，序文曰：“因取古今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匯為正集，即間中有瑰麗之篇，要旨歸於古雅”說明文章需“載道”、“明道”或“揚道”才會收入於選本中，這是要求之一。要求之二，則是在審美上要達到“辭義精純”或“要旨古雅”。此要求只要達到其中之一者，便會收入於選本中。此兩者是選本的選文標準，同時也是選本的文學主張。除此，其第一個要求亦呼應了上文所提，康熙對“返本歸經”之訴求。<sup>49</sup>

---

<sup>48</sup> 按《古文淵鑒·序》：“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呂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代各為以篇。夫典章法度燦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后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於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恒通，於千載損益非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著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

<sup>49</sup> 縱觀選本之序文，其編選宗旨、理論基本能以徐乾學〈《御製古文淵鑒》凡例〉裡的一段文字來總結：“揭萬古於以闡揚理道，則翼贊乎經籍於以敷陳政事；則裨益夫治體尋其旨趣。固足以啟發神志，稽其故實，亦足以增長見聞，誠訓世之要編，覺民之鉅典。”（頁768）



## 第二節 《唐宋文醇》的選本意義

《唐宋文醇》制於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全書共五十八卷，所收文章總數為四七二篇。當中收錄的十位唐宋古文大家之作品，他們分別為韓愈、柳宗元、王安石、歐陽修、蘇軾、蘇轍、蘇洵、曾鞏、孫樵以及李翱。《唐宋文醇》序文裡已透露，選本是乾隆君臣在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基礎下編選而成。乾隆制序曰：

“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於固，毋抵而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矣。顧其識之為衷，而見之為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徑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張照等輯評，2005：460-1，2）

儲欣在其《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裡欲糾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對唐宋古文大家之刻板設定，以及以時文標準評點古文之做法<sup>50</sup>。對於儲欣這種志願，乾隆表示十分讚賞。然而，乾隆認為儲欣仍無法一改《唐宋八大家文鈔》之評點方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還是與《唐宋八大家文鈔》之評選意向相去不遠。因此乾隆才親自組織學者御製《唐宋文醇》，以此矯正儲欣選本之不足。

接著，序文開宗明義即透露出其崇儒重道的思想內涵：“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群言有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為歸。”乾隆強調“立言”，是以

---

<sup>50</sup> 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夫能為八比者，起源必出與八比，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為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轉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於講經評史，而轉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頁 2657）

顯示其重視文學的態度<sup>51</sup>。而如要達到“立言”，寫出足以流芳百世之文，則需回歸至周孔之理論。這亦是一種“返本歸經”之文學主張，與《古文淵鑿》所提倡之“返本歸經”有其異曲同工之妙。《唐宋文醇》之“返本歸經”是把文學理論追溯至儒家極為重視之聖人——周孔的思想中；而《古文淵鑿》則是把文學，文體之淵源追溯至儒家經典中。

選本之文學理論，序文裡曰：“周公曰：‘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是以要求為文要條理清晰，盡如其意。又有“文所以足言，言所以足文，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說明文章需言之有物，為文者應具備思想、抱負，而不應隨波逐流，如此才能寫出內容豐富飽滿之文。言之有物，其條例才清晰，而能盡如其意，此文學主張皆與桐城派“古文義法”<sup>52</sup>如出一轍。除此，其與《古文淵鑿》之“文者，載道之器”也頗為相似。兩者皆要求文章不能空無一物，最終流於空談。其相異處僅僅是康熙著重於“道”之宣揚，而乾隆則強調“志”之抒發而已。接著，選本對駢文也頗有一番獨到見解。乾隆認為駢文若亦達到“有序”、“有物”、“辭達”之水平，亦可視為佳作。這某程度上也呼應了《古文淵鑿》亦收錄駢文之處理方式。

---

<sup>51</sup> 按孟偉〈清代古文選本的編選、評點及其文學批評意義〉：“乾隆的這篇序文（指《唐宋文醇·序》），完全以儒家的傳統文論為立論基調。首先申明‘立言’為‘三不朽’之一，這是對儒家傳統價值取向的肯定。對於普通士子來講‘三不朽’中的‘立德’、‘立功’并不能輕易做到，而‘立言’則較為現實。”（頁45）

<sup>52</sup>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曰：內容上要求言有物，形式上要求言有序；兩者的關係是形式取決於內容，內容又不可能脫離形式。（頁116）

### 第三章 《古文淵鑒》柳文評點芻議

《古文淵鑒》共收錄柳文十九篇，分別為四篇政論文——〈駁復仇議〉<sup>53</sup>、〈晉文公守原議〉<sup>54</sup>、〈守道論〉<sup>55</sup>與〈封建論〉<sup>56</sup>；三篇書信——〈答韋中立論師道書〉<sup>57</sup>、〈與韓愈論史官書〉<sup>58</sup>與〈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sup>59</sup>；三篇碑文——〈箕子碑〉<sup>60</sup>、〈南府君睢陽廟碑〉<sup>61</sup>與〈劍門銘〉<sup>62</sup>；兩篇書序——〈柳宗直西漢文類序〉<sup>63</sup>與〈裴崇豐二陵集禮後序〉<sup>64</sup>；一篇行狀——〈段太尉逸事行狀〉<sup>65</sup>；一篇墓表——〈陸文通先生墓表〉<sup>66</sup>；一篇雅詩歌曲——

<sup>53</sup> 〈駁復仇議〉：駁陳子昂〈復仇議狀〉“誅而後旌”、“禮法兩全”之論，主張“刑不避大臣”，並且公開挑戰儒家之“刑不上大夫”。

<sup>54</sup> 〈晉文公守原議〉：借古喻今，認為“賊賢失政之端”皆因君主與宦官私下議定重臣之人選，隱射當朝憲宗皇帝重用宦官。

<sup>55</sup> 〈守道論〉：否定《左傳》中所引孔子之語——“守道不如受官”，而認為守道與守官乃是同一種修行，提出“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

<sup>56</sup> 〈封建論〉：主張“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比較封建制與郡縣制之利與弊，認為封建制實不可行。針對當時妄圖恢復封建制之思潮，給出有力之抨擊。

<sup>57</sup>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記錄柳宗元師道與文道，以及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經驗之談。

<sup>58</sup> 〈與韓愈論史官書〉：痛駁韓愈“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之論，認為“凡局其位，思直其道，苟道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sup>59</sup>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柳宗元對太學生極力留住陽城於京師之舉表示支持，並且為文以聲援之。

<sup>60</sup> 〈箕子碑〉：為箕子立之碑，贊其“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摸。”

<sup>61</sup> 〈南府君睢陽廟碑〉：記述南霽雲與張巡、許遠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固守睢陽，屏障江淮，牽制敵人的歷史功績。

<sup>62</sup> 〈劍門銘〉：記述嚴礪等人平定劍南西川副節度使劉辟掀起之叛亂。

<sup>63</sup>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讚揚柳宗直此書治史嚴謹，論述完備，繼承了古賢之風，達到了很高的成就。

<sup>64</sup> 〈裴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批評“不學之士”妄言避諱，取消天子兇禮大典，最終導致此類禮儀缺失。指出“禮不執，則不行”，並稱讚裴堽繼承世代修禮的家風，以至邦典不墜的“愛禮而近古”的行為。

<sup>65</sup> 〈段太尉逸事行狀〉：柳宗元從邠州當地的老校退卒口中了解到段實秀的為人和行事，於是記述了下來，頗有史料價值。

<sup>66</sup> 〈陸文通先生墓表〉：墓表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指出陸質新《春秋》學的意義與貢獻，並藉此表達自己的一貫思想——“聖人之道”與“生人之道”之緊密聯繫；第二部分則指出陸質對生人之道不僅能使其“光明”，而且能身體力行；第三部分則為陸質的逝世感到惋惜。墓表主要不是記述死者的生平事跡，而是介紹其學術思想。

〈獻平淮夷雅表〉<sup>67</sup>；以及四篇臺閣名勝記文——〈興州江運記〉<sup>68</sup>、〈邠寧進奏院記〉<sup>69</sup>、〈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sup>70</sup>與〈監察使壁記〉<sup>71</sup>。

這十九篇柳文或論“政”或論“道”，論“為文”與“為史”則分別各有一篇。從選本對柳文之篩選，可知其中多是“有益于天下”之文。此“有益于天下”之文不僅可明理致用，而且能施用於當世之務（王亞楠，2013:111）。此類文章都屬於實用文章，具有教化以及勸誡之作用。

### 第一節 社會歷史批評<sup>72</sup> 下之柳文

《古文淵鑒》處理柳文之選、評，如上文所提，多是把焦點置於文章的實用性以及教化、勸誡之功能。選本擅於從社會批評之角度評點柳文，並強調文章對於歷史事件之總結以及其社會的功能。故《古文淵鑒》中，柳文呈現可“明理致用”以及“施用於當世之務”之貌。而眾所周知，柳宗元聞名於世之遊記文章、寓言散文，選本則一概不錄。此可謂康熙君臣籍以《古文淵鑒》整肅學風、文風，相當徹底之舉措。欲達致從虛無縹緲之文風過渡至“實學”，選本採取了全面集錄實用文章之方法，並且以批判眼光評點文章，總結出歷史之得失。

---

<sup>67</sup> 〈獻平淮夷雅表〉：歌功頌德之文，說明為何寫〈平淮夷雅〉二篇

<sup>68</sup> 〈興州江運記〉：記敘興州開山導江工程的經過，也反映柳宗元在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實行屯田、鞏固邊防等方面的主張。

<sup>69</sup> 〈邠寧進奏院記〉：記敘記敘進奏院的功用、沿革演變和朗寧王在進奏院的種種活動。文中多用駢句，講究詞采，體現柳宗元早起為文的特點和風格。

<sup>70</sup>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通過馬總概見饗軍堂一事，記敘他的職責之重大，饗軍堂之作用、氣勢和改建原因。

<sup>71</sup> 〈監察使壁記〉：為監察使一職所寫之壁記。詳盡記載監察使一職之沿革演進、職責和祭祀活動時複雜之操作程序之外，也闡述祭祀之教育作用與現實意義。

<sup>72</sup> 一種從歷史角度觀察、分析、評價文學現象的批評方法。其側重於探討作品與社會生活之關係，重視作品之社會作用。

如〈晉文公問守原議〉一篇，評點就柳文探討之宦官之禍，對順宗新政時期二王八司馬之亂給予了評價。評點引陳子龍曰：“當時丕、文之黨盡，欲奪北衙之勢，張南衙只權，但其行事躁妄，終以自敗，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承認了王丕、王叔文等人之政治理念，並指出其失敗之緣由，乃是因其操之過急所致。另一方面，評點亦引了黃震曰：“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讚同柳宗元所言，天子不應與宦官共朝廷之大事。《古文淵鑿》處理柳文之評點時，擅於兼取不同觀點，旨在啟發讀者從不同角度認識與思考問題。故評點之間看似無所關聯、格格不入，實則達到了對同一議題互相補充之效，使得讀者對議題有著深刻與深入、全面之思考。（王亞楠 B，2011：25）

又如〈箕子碑〉一篇，評點引謝枋得曰：“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稱謂心胸豁達，識時務並且能屈能伸之人。再引黃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輕重”認為柳宗元對箕子之見實屬難得，但不應以比干和微子與之比較孰是孰非。選本雖認同柳文之觀點，但亦指出其中有值得商榷、斟酌之處。此種處理方式，在社會歷史批評作用底下更顯得客觀以及面面俱到。至於論及這篇文章可“施用於當世之務”之處，則得從康熙之立場看待。當初編撰《古文淵鑿》時，乃是大清局勢初定不久。此文章是以勸誡明末遺民<sup>73</sup>，勿對前朝念念不忘，而是應如箕子所為，“能屈能伸”並且“捲土重來”，脫離隱士身份，把自身才華奉獻於社會，使道統不滅。

按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在易朝短短十幾年之間，第一代遺民對於夷夏之分已無法始終堅持。如顧炎武以及黃宗羲，與朝廷命官關係頗為密

---

<sup>73</sup> 在此專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傅山、呂留良等明清之際之思想家、學者。在明清改朝換代之時，一度憤懣地批判明末社會之黑暗腐敗，也曾抵抗清廷之統治，最終以“遺民”自居，歸於隱遁。

切。可見民族主義逐漸暗淡（葛兆光，2003:288）。選本編撰，恰逢此時各大極具影響力之士人陸續離開人世，或對明朝依戀漸漸淡忘<sup>74</sup>。故選本於柳宗元眾多古文中，選錄〈箕子碑〉為十九篇之其中一篇，其極有可能藉以文章一方面表彰顧炎武以及黃宗羲等人逐漸親近朝廷之舉措，一方面也勸勉其他還未歸順之明朝遺民，效仿箕子甚至顧炎武等人。

兼取各家觀點之《古文淵鑿》，其社會歷史批評之公允可說毋庸置疑。然對於文章實用性之考量，其往往還是無可避免地傾向於對朝廷有利之一方。須知所謂“有益于天下”之文，既可客觀地——確實有助於或可啟發仕人之文章；亦可是統治者（編撰者）之主觀認為，即可合理化朝廷政策、地位，或消除讀書人獨立思考能力，諸如此類之文。選本在處理柳文，或其他古文時，摻和一些官方意識在裡頭，似乎不無可能。結合選本之時代背景，以及選家意識，從此角度再審視如〈箕子碑〉之類柳文，方可得出選本之真實意義——嘗試以精準之洞見觀察選本之弦外之音。

〈封建論〉一篇，亦有其幾乎微不可察之政治意識。明清之際學者諸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都曾撰文，主張“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顧炎武，1996:24），或行“小封建法”（黃宗羲，2012:6），爭取在專制體制中，尚可保留士紳一些批判與發聲空間。清人入關以來，朝廷採取壟斷社會意識形態之思想鉗制政策，往往導致士人失去其獨立人格。“公”對於“私”之壓迫，官方入侵士人之生活與思想空間，迫使士人不得不另覓得以自由言語，逃離皇權、體制之外之容身處。（葛兆光，2003:396）故清初聞名思想家紛紛提出恢復小

---

<sup>74</sup> 《古文淵鑿》制於公元 1685 年，1702 年完成。而黃宗羲辭世於公元 1695 年；顧炎武 1682 年；王夫之 1692 年；傅山 1684 年；呂留良 1683 年。可知正是前朝遺民之民族意識已逐漸淡薄之時。

規模“封建制”之主張。該訴求最終被雍正皇帝徹底扼殺，此乃後話。回歸本文“歷史社會批評”之主題，選本選錄〈封建論〉一篇之緣由即呼之欲出。只是，選本仍然以一種歷史總結之態度處理此文。評點引葉適之觀點“自晋楚灭，国最多已自别为郡县。至秦，始尽空之，天地霍然一变大，要古无封建之论，因李斯不主，后世之说方角立，而宗元遂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選臣再補充：“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與井田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評點同意柳宗元之觀點，並總結出“封建制不可行於後世”之說。雖然選本始終未結合當世之情況來評價此文，然選本借鑒歷史之意涵，已不可謂之無針對當世士人主張作出回應與反擊。

當然，選本評點之具體情況複雜，故不可謂其十九篇柳文皆以社會歷史批評之法分析、評價。社會歷史批評視角僅是選本側重方法之一，即陸德海曰：選本批評具有不拘一格之特點，或側重於分析文章事理，或注重批評文學風格，或注重皆是文章之法，具有集大成之特點。（陸德海，2010:85-86）而本文重點探討選本之社會歷史批評視角，因《古文淵鑒》異與其他文人所編之選本，乃是朝廷所制。欲以區別兩者之長，必由其大異始之，那就是看待文章之立場，方可一窺柳文於官制選本其面貌與意涵有何不同之處。

選本此種評點法，其隱藏之政治意識不可忽視。鑒於選本兼採多家觀點，故其歷時總結抑或借鑒皆能客觀反映柳文觀點之多面性。而與此同時，此種客觀性亦限於選家立場不同，而有其“主觀”存於裡頭，而此“主觀”甚至可壟斷社會之政治意識。選本雖集多家觀點，得以中肯、公允之態度評價柳文，然實有其一定政治目的性。

## 第二節 官方意識下之柳文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 中國散文概論》曰：凡是亂極思治時，文學上心理亦不覺趨向這一點，大家手眼之處，皆趨於掃淫而歸清正，一心樹立和平文學（方孝岳 2007:265）。清初學者對於明末之總結、批判，使學術思潮為之一變。學術思潮之更變推動至其他文化領域，其中之一則為文風。文化鉗制作為清廷政治手段，康熙弘揚文治之時，亦採取從文學處著手，御製《古文淵鑒》以鼓吹官方文學主張。其中一些文學主張絲毫不陌生，可說在選本之前，已有許多學者以及文人皆不約而同推崇之——即“返本歸經”思想。

對於此，王亞楠《古文淵鑒》研究亦曰：面對明末文化頹勢，清初出現了極為吊詭之局面與現象，即反清復明之顧炎武等人與官方同時倡導“程朱之學”（王亞楠 B, 2011: 11）可見“返本歸經”之學術思潮乃是當時代之文化標誌。起初，這種文化思潮乃是由士紳階級所掌握，直到這種文化權利轉移至朝廷，屆時皇權佔有了正當性，進一步確立不僅在政治上，甚至道德上之合法性（葛兆光，2013:393）。然而這已是後話，其在康熙之後之雍正時代才完全實現。<sup>75</sup>至於此前，清廷對文化思想之掌握，以達到以上政治目的，則不可不作為選本之編選意識之一以看待。

首先選本對於文風之要求，亦有其官方意識在內。歸納所有柳文之評點，可察《古文淵鑒》有意藉以柳文確立一套官方為文之標準。而選本所架構起，官方對文章之要求，實是形成後來“清真雅正”為文標準之基礎。序文曰：  
**“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匯為正，即間有瑰麗之篇，要旨歸於古雅”**，強調文章須“辭義精純”，即有“瑰麗之篇”，其要旨亦需“歸於古雅”。“辭義精

---

<sup>75</sup> 詳見葛兆光（2003），《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390-397。



純”指內容需嚴謹而凝練；“要旨歸於古雅”則是指風格而言，用辭華美之文，應也具有古樸、雅緻、莊重之韻味。而這種為文要求，實是“希望樹立和宣誓這些原本經術、古雅醇正的文章為正宗”（王亞楠，2013：110），以此取代明代頹廢、萎靡之文風。

故而在柳文之選、評中，選本非常注重突顯柳文之“辭義精純”與“古雅”之篇。對於符合標準之柳文，康熙君臣會稱賞之，并肯定其價值。而讚賞之辭中，往往出現三個字用之十分頻密，此三字分別為“精”、“古”以及“雅”，正正呼應了序文對文章之要求。

以下列表顯示所有柳文以及其帶有“精”、“古”以及“雅”字眼之評語。

篇章	評點
〈駁復仇議〉	挈出刑禮，二字并提作骨，駁辯至為 <b>精核</b> 。 東發黃震曰：旌與誅莫得而并，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 <b>精合</b> ，與昌黎仇議參看。 荊州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 <b>理精</b> 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豎議 <b>精嚴</b> ，遣詞緊拔，森人法戒之文。
〈封建論〉	博辯縱橫，直至沉鷲，中間錯舉秦漢唐之制，引據甚 <b>精</b> ，斷制甚確。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詞旨 <b>雅</b> ，暢中寫有好賢與善之意，故倍覺娓娓可思。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臣廷敬曰：崇閔之論妙于發端瑰偉之詞，工于鋪敘，詳而不煩，質而能 <b>雅</b> 之文。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此篇逼真西漢， <b>近古</b> 而尤壯麗，殆之後所以自狀其文品也。

〈裴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通篇惟用直敘，此所謂 <b>淵雅</b> 之音，固無須于抗墮也。
〈南府君睢陽廟碑〉	麗而不佻，縟而能 <b>雅</b> 。
〈劍門銘〉	臥子陳子龍曰：孟陽垂戒之文，此是銘功之作， <b>雄雅</b> 不同，各有其體。
〈獻平淮夷雅表〉	頌頤國美之大典， <b>雅</b> 為尚，紅瞻次之，華縟又次之，如此其上乘也。 臣熙曰：頌揚得體， <b>雅飭</b> 不浮，諷誦一過可謂穆如清風。
〈陸文通先生墓表〉	臣廷敬曰：首尾以《春秋》一事闡發，乃文之特例。而其混淪滂魄， <b>淵古</b> 之氣蒸浹肌髓，固當雄視一世。

列表顯示，十九篇柳文裡即有十一篇之評點出現此三字之其中一者。這些符合“辭義精純”或“要旨古雅”之柳文，雖達致同一種文章標準，其內容核心、意涵卻不盡相同。評點之“精”、“古”、“雅”其具體含義無絲毫雷同，如〈駁復仇者議〉之“挈出刑禮，二字并提作骨，駁辯至為**精核**”以及〈晉文公問守原議〉之“豎議**精嚴**，遣詞緊拔，森人法戒之文”，評點雖同強調“精”，但前者“**精核**”為“關鍵”、“重點”之意；而後者則形容理論“滴水不漏”、“系統”、“嚴密”之“**精嚴**”。可見同是雖符合選本文章標準之柳文，但各有所長。如此是以“樹立寫作文章的‘金科’、‘玉律’”（孟偉，2005:29），一改前朝之文風。同時，這也是對儒家正統文學觀念之推崇，因“文辭古雅”即康熙對

儒家正統觀念之理解（孟偉，2015:46）。換言之，選本藉以柳文確立“典雅醇正”之正統文章風格，正正是出於對儒術之推崇。<sup>76</sup>

接著，序文亦曰：“……可以鼓吹六經者匪為正”，即強調收錄能彰顯儒術之文章。只是觀察柳文之評點，卻發現選本側重多是柳文之審美價值，以及其社會或歷史意義，對於文章“道”之內涵極少直接評論。非選本無顧及此也，實則其更傾向藉助柳文，將“道”之意涵推廣及傳播。籍以古文，以證其主張，而非選家自說自話，自圓其說。是以選本選錄之柳文，處處多見儒學之痕跡。或非文章之核心主張，僅僅只是說明之補充哦日，然歸納而觀察之，便可尋獲其共同特性。

以下即羅列出了各篇具有儒學痕跡之柳文：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暢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
〈與韓愈論史官書〉	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怒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虜，皆非中道。
〈邠寧進奏院記〉	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周禮》：祭仆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聞。

<sup>76</sup> 按王亞楠《古文淵鑿》評點意向與影響芻論曰：“他們（指選臣）在評語中經常指出此種風格的獲得，是由於作者湛深經術。原本六經的文章，自然典雅醇正，也猜能夠典雅醇正。他們認為陳情之文，原據經術，才更卓然可貴。文本於道，才能不同與詞章記誦之學。”（頁110）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
〈裴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于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與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封禪……
〈駁復仇議〉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
〈守道論〉	《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列表顯示於十九篇柳文中即有九篇有著談及儒家經典之文章。其分別涵蓋了為文、為史官、禮儀以及制度的範疇。其中〈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道出為文當本之經典，以經典為楷模。〈與韓愈論史官書〉則從孔子處說起歷代史官寫史之遭遇——不以寫史招禍。〈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則記錄了漢朝之前，紀言、紀事史書之流變。〈邠寧進奏院記〉羅列了歷代朝覲之制度，〈監祭使壁記〉以及〈裴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則說述禮儀制度之歷史流傳。此六篇皆具有“歷史淵源”之闡述，似乎隱藏著“文統”、“史統”以及“政統”之意識。而其事件之源頭亦從儒家經典出說起，可見其“返本歸經”之意識可從柳文中一一尋獲。

惟有一些特殊情況，選本才會直接提到有關推廣儒術之話語。如〈陸文通先生墓表〉一篇，其眉批曰：“表章經學文要須如此簡要”。如是評價對〈陸文通先生墓表〉一文十分之普遍，是以何焯《義門讀書記》裡也讚揚柳宗元“學

《春秋》有得者，故有味乎其言之”；沈德潛《唐宋八家讀本》也稱“此篇‘明章大中’下一段，極言所學之醇，得春秋之提要矣”。點評家皆一致認同〈陸文通先生墓表〉展現柳習得《春秋》精髓之一面。而此種評價出現於《古文淵鑒》，更顯得別具意義。

除此〈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也有類似評點，選臣士奇表示：“……推本經術，不區區以文法為工也”，而選本也引用茅坤評點——“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見矣”。選本通過對文章之審美價值認同，一併強調“返本歸經”之思想內涵。接著，〈守道論〉裡，選本引用了真德秀評點，對“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以宋明理學尤其興盛起來的著名理論進行了一番解說。最後，對於〈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篇，柳宗元把儒家經典與道家典籍並舉，選本也直接地提出了批評。選臣敬廷曰：“……文特辯肆界，兀獨是篇中孟荀莊老並舉，雖所見未純故當節取其長”。即可知選家對樹立儒學之堅定。

總得來說，《古文淵鑒》藉以柳文欲以闡發之觀點，其中有選本對於“返本歸經”思想之推崇，亦有古文寫作文風之確立。而對於文章之社會、歷史價值，選本亦有其“主觀”意識貫於“客觀”觀點之內。選本即藉以柳文樹立其正統思想，同時也欲達致“明理致用”之效。如同王亞楠所言：朱子之學有其弱點。經學解決的是是非問題，史學解決的才是成敗問題。朱子之學屬經學之範疇，其實用的缺點必須由其他學科之只是體系進行彌補。（王亞楠 B, 2011: 20）故此選本在樹立其正統思想之同時，也強調文章之實用性，使選本在真正意義上摒除了明末之頹靡文風，進入到文章實學實用之時代。

#### 第四章 《唐宋文醇》柳文評點芻議

《唐宋文醇》裡共收入了 85 篇柳文，當中有多達 26 種文體，分別為雅詩、歌曲、古賦、論、議辯、古聖賢碑、行狀、碣、表、志、問答、說、傳、吊、贊、箴、戒、銘、雜題、序、記官署、記亭池、記祠廟、記山水、書、啟、祭文以及騷。有鑒於選本僅收入唐、宋時期之古文，或更準確之說法——只收入唐宋十大家之古文，其所囊括之古文範圍大大縮小，故對各作家收入的篇章相對增加，更具彈性與包容性地盡可能把柳宗元的各類文章都納入選本當中。

##### 第一節 柳文比較——選本之上承《古文淵鑿》

《唐宋文醇》是乾隆時期繼《欽定四書文》之後，另一部沿用《古文淵鑿》之法<sup>77</sup>，以“欽定”之方式來規範全國文章寫作標準之選本。《欽定四書文》乃是時文寫作法之官方參考用書，而《唐宋文醇》則是古文寫作法之官方參考用書。《唐宋文醇》遵循《古文淵鑿》之編選用意而作，繼承了部分《古文淵鑿》對於寫作的要求，也對《古文淵鑿》之文論有所延伸以及突破<sup>78</sup>。在維護《古文淵鑿》對文章要求的同時，也奠定了一種新的文論基礎，這項突破將影響清代後世之文壇，為後來的桐城派醞釀一片合適的發展土壤。<sup>79</sup>

《唐宋文醇》所選之柳文一共八十五篇，其中有十三篇正是《古文淵鑿》裡亦有收入。這 13 篇柳文分別是〈駁復仇者議〉、〈晉文公問守原議〉、〈封

---

<sup>77</sup> 按孟偉〈清代敕修文章選本及其對文風建設的意義〉：雍正融合儒、釋、道，使其為己所用之思想與康熙尊孔崇儒，定理學於一尊的思想不相一致。而乾隆即位后，並沒有基層雍正之政策與思想，而是採取了裁汰僧道之措施。思想上繼承康熙時期的傳統，仍然獨尊儒學。（頁 30）故本文跳過雍正之御選文集——《悅心集》，而僅僅比較《古文淵鑿》與《唐宋文醇》。

<sup>78</sup> 按陸德海〈從預先文章看康、乾文章思想的轉變〉：康熙之做法有集大成性質，其標準因寬泛通達而顯得不夠明確；乾隆不僅繼承了“御選”一做法，而且進一步縮小了師法對象的範圍，專門提倡唐宋古文。（頁 80）

<sup>79</sup> 按陸德海〈從預先文章看康、乾文章思想的轉變〉：康熙提出的“辭義精純”、“歸於古雅”的文章理念，到了乾隆時期終於成為現實。（頁 92）

建論〉、〈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劍門銘〉、〈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與韓愈論史官書〉、〈守道論〉、〈箕子碑〉、〈陸文通先生墓表〉、〈興州江運記〉以及〈段太尉逸事狀〉。而此十三篇柳文中，其中七篇之評點直接引用自《古文淵鑿》，或取其全，或摘錄其中幾句。

《唐宋文醇》與《古文淵鑿》不同，《唐宋文醇》更為注重義理之闡發，而較少談及文章之文學內涵以及文章結構。對於一些以審美、辭藻見長的敘事柳文，如〈劍門銘〉、〈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以及〈興州江運記〉，選本則直接引《古文淵鑿》之評點，而無多作評論。然而〈段太尉逸事狀〉一篇則較特殊，從選本選擇的評點上，可看出其是以一種義理闡發為主之前提來決定該引《古文淵鑿》哪一些評點。其中四則評點裡，其中之一曰：“張英曰：敘太尉三事皆剛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強禦，不侮鰥寡’者歟。筆勢復陡健雄，邁曲盡情事。”其引用儒家典籍——《詩經》裡之詩歌闡發論點，故被《唐宋文醇》引至選本裡。

而議論文，如〈與韓愈論史官書〉以及〈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前者論史官，後者論為文，皆是文人於用功時可參考之文章。《古文淵鑿》收錄此二篇是以標榜柳宗元論點之可取。《唐宋文醇》對於《古文淵鑿》此番用意則給予一種支持。故對於此兩篇柳文，《唐宋文醇》亦是引評點自《古文淵鑿》。而後在其他柳文中，選本才對柳宗元的這一方面的觀點一一評點、闡發以及再作補充。如〈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sup>80</sup>裡，選本就再一次提起了〈與韓愈論史

---

<sup>80</sup>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書里表達韓愈接受柳宗元之對於史官之道的意見，並視柳宗元為諍友。而柳宗元也在書裡告知韓愈其已把所收集整理的段秀實逸書上報史館。柳宗元將韓愈與司馬遷相提並論，可見其對韓愈文才學識之推崇。

官書》，否認韓愈不敢為史官一說。而〈與友人論文書〉<sup>81</sup>以及〈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sup>82</sup>裡，選本也對柳宗元之為文之論加以發揮，并把義理加於評點之中。

由此得知，《唐宋文醇》對於柳宗元之史官論、為文論實無不有看法，只是處理《古文淵鑿》亦有收入之〈與韓愈論史官書〉以及〈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時，選本選擇優先採用了《古文淵鑿》裡之評點，首先形成一種官方對柳文此觀點之一致認同。然而若再仔細觀察，可知《唐宋文醇》如此處理方式僅僅處於表面上。在其中一篇柳文——〈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選本所引《古文淵鑿》之評點，非針對文章論點發揮，反而是貶低文章之詞：

“茅坤曰：子厚書中所論文章之法，猶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鑿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剝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

評點表示柳宗元無法達至自己文章中所提之為文境界，故茅坤嘲諷之“不自量”。《古文淵鑿》六則評點裡，乾隆君臣偏偏擇此貶低文章之評點。可見乾隆君臣雖於表面上呼應《古文淵鑿》裡之說法，然并非盲目跟隨，而是指出了此篇柳文之謬處。可見《唐宋文醇》雖似乎繼承《古文淵鑿》之法，但當中所展現之柳文面貌卻大不相同。

---

<sup>81</sup> 〈與友人論文書〉：論文章之難：“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古今上下千年，從事文章者不可勝數，然而能“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再談文章之流傳、名聲之確立，并不以作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是受到世風認清的種種制約。知音難尋，榮古陋今，造成文章之士的厄運。

<sup>82</sup>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吳秀才前時已寄書與柳宗元，此次又寄來新作詩文，請柳宗元斧正。柳宗元以為比前時大有可觀。



至於無應用評點自《古文淵鑒》之柳文，選本之處理方式多是以補充或延伸前者之評點為主。如〈封建論〉一文，選本引《古文淵鑒》裡亦引用之評點，然卻是完整引用，是以補充與延伸《古文淵鑒》之評點。而〈守道論〉一篇，《古文淵鑒》採用真德秀之評點，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闡述柳宗元為官之道。而《唐宋文醇》則論述了何為“道”、“為官”與“道”又有何種關係。《唐宋文醇》對《古文淵鑒》之“道”加以說明，兩者之評點可互相呼應與參照。接著，又有〈駁復仇者議〉一文。《古文淵鑒》之評點提及了此文可同韓愈〈復仇議〉參看，《唐宋文醇》在評點裡即引用了韓愈〈復仇議〉，並且進行了相當全面的解說。

除此，《唐宋文醇》如何處理遊記文章亦可看出其對《古文淵鑒》之繼承。遊記文章為柳宗元得心應手之作，其價值比柳宗元其他任何文體都還要勝出一籌。然《古文淵鑒》卻一篇也不載，而《唐宋文醇》內則收入了十篇之多，甚至佔了柳文總體之 11.76%。其比例相當高。雖《唐宋文醇》亦收錄《古文淵鑒》內並無收錄之文體，包括柳宗元另一種同是引人注目之寓言與傳記文章。然《唐宋文醇》對遊記文章之處理方法明顯與其他文體不同。即《唐宋文醇》對遊記文章極少評點，其永州八記更只是收其文，而無評點。可以說，《唐宋文醇》對於柳宗元遊記文章之態度，雖選本裡所有收錄，實際卻不是那麼看重。這種處理方式大抵與《古文淵鑒》有異曲同工之妙，《古文淵鑒》亦是不如和看重柳宗元此些聞名於世的文章，因其無法達致經世致用，教化人民之益。《唐宋文醇》限於選本之性質，盡可能收得廣而多，因而才把柳宗元之遊記文章也收錄其內。

《唐宋文醇》對於《古文淵鑿》之繼承、發揮與延伸，可說於在一種無可奈何之前提下，被迫遵守之。乾隆在文治之宣揚上，對於古文要求以及正統思想之歸依，選擇繼承康熙之主張。這是乾隆自由意志下的結果。然既然選擇了繼承其祖父——康熙之文學與思想主張，乾隆身為其皇孫，則必須注意以“孝”與“敬”為重。除此，也為了維護官方說法之一致性，故對此十三篇柳文，選本當以呼應《古文淵鑿》裡之說法，而非公然挑戰之。雖說如此，此種帶有敬意之繼承與延伸也絕非盲目與被動。乾隆君臣之文學理論以及點評體系原來即有其特性與突破，在處理這幾篇柳文時，乾隆君臣一方面對先帝之《古文淵鑿》致敬，一方面也不斷強調其固有之核心觀念。

## 第二節 官方意識之突進——帝王意識與義理闡釋下之柳文

康熙時期大局初定，為了確保江山的穩定，朝廷對文治的弘揚仍是有所保留。在文化鉗制方面，康熙也主張以懷柔手段，對思想、學術方面的監控還尚有餘地，對文人與文壇風氣還算寬鬆、開放。當時對於文學作品的整理，也較為單純與直接地為宣揚文治而服務。直到乾隆時期，清朝統治天下已成定局，毫無回轉的可能。這時，乾隆帝開始大力進行文化專制，大興文字獄。而除了文字獄，乾隆也通過各種管道，施加官方思想意識於文人，以力保文人的絕對順從與配合<sup>83</sup>。這樣的政治手段可說無處不在，即使是作為糾正文風所用，官方為文標準用書之《唐宋文醇》也難逃乾隆帝想要支配其文論、思想之想法。因此，一觀《唐宋文醇》之柳文評點，其明確之帝王意識輕易可察覺而出。

---

<sup>83</sup> 按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康熙時代以後，士人對現實的淡漠和古典的關注，除了政治對一段的鉗制，還在於皇權對於真理的壟斷，“治統”對“道統”的徹底兼并，導致士人對真理的詮釋權利和對於社會指導權利的喪失。（頁 399-400）故此，清初統治者一直到乾隆，都對文集、經典之編選與注釋孜孜不倦，以便支配文化與思想。

如〈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sup>84</sup> 一篇，評點裡就強調臣子之職，并稱讚柳宗元之忠君——“夫以人事君，人臣之大義也。宗元之賀趙宗儒，誠心不忘君也哉”這樣的評點從官方御製之選本出現，無疑體現出一種推崇忠君的思想。乾隆對臣子之要求，就看出其明確的帝王意識，是以規範朝臣之行為思想。接著，又有〈答周君巢書〉<sup>85</sup> 一篇，選本之評點洋洋灑灑地闡述了人應該如何面對死亡，以及強調升仙、長生不老之不切實際。評點花了一大篇幅帶出此升仙、長生不老之課題，這樣不尋常地大量耗費筆墨，直接讓人聯想到編選者是為了一掃世人對統治者普遍迷信於長生不老的看法，評點十足扮演著澄清的作用。這也是乾隆的帝王意識加於文章、選本之中。除此，還有〈宋清傳〉<sup>86</sup> 一篇，也是一篇長篇大論、喋喋不休的評點。乾隆帝從柳宗元關於交友之觀點，引述至交友之道，又與君臣之道相結合，并施於朝中關係來論述一番。這樣立論的出發點，顯而易見是受乾隆帝王意識的影響。以上三篇柳文評點之例，皆可總結出選本之柳文具有帝王意識的存在。

在對柳文之評點，乾隆君臣好以進一步發揮柳宗元之觀點，或引申至其他課題、或注重解世之疑惑，如上一節所提起，乾隆君臣極少在文章學之範疇裡給予評點。往往在評點時，更喜好冠以義理分析。這種評點模式可說是與《古文淵鑒》全然不同。這種差異歸咎於兩部選本所編選年代之不同。前者編《古

---

<sup>84</sup>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讚賞趙宗儒任用符載為記室是“直到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符載是一位有能之人，卻遭到妒忌者之指責誣謗，使上位者都不敢任用於他。唯獨趙宗儒超拔世俗，不受“忌嫉者橫致唇吻”的影響，而以符載為記室，應受到大家的尊敬。

<sup>85</sup> 〈答周君巢書〉：章士釗《柳文指要》：“周君巢者，子厚相識中一幕客也，而子厚復書拒之”

<sup>86</sup> 〈宋清傳〉：記宋清所賣藥材皆善藥，並且對病人一視同仁，不以貧富計之。使得其經營藥材四十年間，無數賒賬之人至死不能還債，但亦有百數十人後來當了官，回報宋清絡繹不絕。諷刺朝廷、官府、士人，反而比不過一介市人。尖銳地批評了爭權奪利、見利忘義、趨炎附勢之社會不良風氣。

《古文淵鑿》純粹只為了更改學風、文風，並且《古文淵鑿》在當時僅僅是確立了一種正統思想的方向而已，雖有嘗試貫徹於選本之中，然而相較於後出的《唐宋文醇》，其處理的手段可說是非常寬鬆的。到了《唐宋文醇》，乾隆君臣在選本內把這種儒學、理學的政治意識形態徹底貫徹，凡評點必與“仁義道德”、“忠君愛國”有關。這種評點的模式，學者陸德海表示：“有時已經到了偏執的程度”（陸德海，2010:90）因此，選本對於柳文之評點，有時不免覺得迂腐。

如〈箕子碑〉之評點則通篇皆是義理分析。評點引用了《易》之卦象來解釋箕子是為一名賢人。接著再分別引用孔子與孟子之語，更進一步地認同箕子為賢人。然後開始論述柳宗元此篇之觀點實是出自孔子。這評點並無直接引申柳宗元之觀點，而是引經據典地證明箕子乃是賢人。這類型的評點，可想而知是絕對不會出現在《古文淵鑿》裡的。除此，還有〈永州新堂記〉<sup>87</sup>一篇，其評點即打著朱子理學之旗幟——“人或良才美質，自天畀之而不學，不問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亂之事，以之終身而不變”強調的都是朱子理學修身之道，提倡窮天理而滅人欲，卻不提文章之審美、風格。

總的來說，帝王意識和義理分析乃是《唐宋文醇》裡對柳文評點的主要模式和特質。這類型的評點無疑是自康熙以來，官方意識突飛猛進之鐵證。與《古文淵鑿》相比，此種評點模式少了對文章“明理致用”價值之闡述，反而過於強調籍以文章以表達自身之觀點，導致其評點無法細緻以及切合文章之旨。

---

<sup>87</sup> 〈永州新堂記〉：記敘新堂的選址、景色和落成後賓客相賀之情景，讚頌韋使君獨特之審美眼光以及他的吏治才能以及品質。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評價選本之處理方式，即可知明確知道官方所鼓吹之意識形態。這對於研究當時乾隆乃至整個清初之政治思想仍有其不可忽視之價值。

### 第三節 餘論——對桐城派文論之影響、對柳宗元之評價

桐城派乃是清代影響最為深遠、規模最為龐大的文學流派。而《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對於桐城派的創立，有著某程度的推動意義。即如《清代文壇盟主桐城派》裡所說：“清初特定的政治思想文化環境為桐城派的產生提供了歷史前提”（楊懷志、潘忠榮，2002:2）而此種思想文化環境，又是兩部選本為其中之有力推手一同構建出來的。《古文淵鑒》作為官方對文風、學風撥亂反正的先驅者，其首先奠定了“文道合一”一文論的傳播基礎，完成了第一波對宋明理學為正統思想之宣傳以及認同。除此，選本所提倡的“辭義精純”、“要旨古雅”也影響了後來官方對文章“清真雅正”之要求。而桐城派創始人之一，方苞亦是迎合統治者對文風要求，來創建桐城派文論系統。由此可見《古文淵鑒》對奠定後世文論是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至於《唐宋文醇》，更是與桐城派文論有直接關係。鑒於方苞在編選《欽定四書文》時，已經強調“清真古雅”、“義法”的文學要求。而後在朝廷在編選《唐宋文醇》之時，也沿用了這兩點作為選本的核心。使桐城派崛起之前，選本已然以為文標準用書之名義，將此文論推廣之整個文壇，正正是塑造了所謂的“歷史前提”。而《唐宋文醇》裡之評點模式，也似乎嘗試完成方苞之後所強調的“能解於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傳之心”（尤信雄，1975:115）而以補充、發揮柳文觀點的方式進行評點。以上種種，足以見得兩部選本在文論、傳播上，都替後來的桐城派鋪下一條康莊大道。

《唐宋文醇》裡也不時提到了對柳宗元在文學上、史學上、仕途上以及為人上的評價。這是《古文淵鑿》所沒有的。對於柳宗元的文學成就，〈答元饒州論春秋書〉<sup>88</sup>一篇的評點裡就稱讚“今觀此文，其勤學好問，惓惓之意，溢於毫楮，可尚也夫。”認同了柳宗元在文學上付出的努力。而對於韓柳之文學造詣熟高熟低，選本在〈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sup>89</sup>一篇裡也評到：“其造詣深淺，須以柳州所論為定，故錄之。且可以見柳之不敢望韓，具所自道中，蓋實錄，非謙辭也”，借用柳文間接地表示韓文在柳文之上。至於柳宗元的仕途成就，選本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sup>90</sup>的評點裡道：“今觀此文所論，其於人情物理，洞達周圍，一絲不隔。然則宗元實能臣，其有德於柳民實厚”說明了乾隆君臣對柳宗元的貢獻是表示認同的。對於柳宗元之為人，選本在〈乞巧文〉<sup>91</sup>裡更說道：

“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諸史傳，其為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於敗，非為機變之巧者也。如為陽城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為耶？”

乾隆君臣在此對柳宗元評價，其不是個特別會見風使舵之機靈小人，會在仕途在失敗只是歸咎於他過於急功近利之故。

---

<sup>88</sup>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書中對陸質其人及其《春秋》之學推崇備致，敘述自己認識陸質和接觸其《春秋》之學的來龍去脈，也說明自己研究《春秋》之淵源所自。

<sup>89</sup>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書中與韓愈相互推重，發自肺腑。

<sup>90</sup>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云饒州主張“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柳宗元對此不敢苟同，而詳加分析。

<sup>91</sup> 〈乞巧文〉：借七夕“乞巧”之文化來抒發自身仕途不振之憂愁。“乞巧”乃是為了祈求上天把笨拙除去，使之機靈。柳宗元以“巧”形容趨炎附勢之人，“拙”以形容不知變通之自己，總結出自己仕途不振，乃是因為不夠“巧”所致。

## 結論

魯迅〈選本〉一文曰：“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魯迅，1981：135）而從《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即可一覽這一點。《古文淵鑒》藉以柳文確立官方思想、文風走向，以集大成者之姿對實用柳文給予評價。其承載官方意識，并在其正統之視野，較為中肯地評價柳文之社會、歷史價值。《古文淵鑒》中，柳文之面貌乃是務實並且端莊、古雅的。皆因選本側重選錄柳宗元在此方面更為突出之文，卻非柳文總體面貌即是如此。

至於《唐宋文醇》則是採取義理分析以評點柳文，而對柳文之結構、風格極少提及。《古文淵鑒》更傾向於對柳文觀點之闡發與發揮，更徹底地“寓自己的意見”。故此，於評點之中往往見選家之主觀意識，多於柳文之評價，以及替柳文增添了一層講究仁義道德之色彩。而似乎此種評點之法，抵消了之前《古文淵鑒》對文章“明理致用”之社會、歷史價值的闡釋，而更趨向選家之思想、觀點之體現。對於兩部選本此種差異，我認為各自有其價值。《古文淵鑒》在統治者之立場，給予了對現實問題之看法，而且其更推崇端莊、文雅，則實現了撥亂反正之功；而《唐宋文醇》更能在選本中彰顯選者之政治思想，與個人價值，在於研究選者其人，即乾隆之思想，乃是十分有幫助的。

《唐宋文醇》繼承了《古文淵鑒》欽定一套為文標準，以及崇儒重道之正統思想，則使柳文在兩部選本中雖面貌不同，然同是扮演著相同之角色。

## 參考書目

### 古籍

1. 【清】紀昀著（2003），《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唐】柳宗元撰（2008），《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唐】柳宗元撰，韓文綺尹占華校注（2013），《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4. 【明】茅坤編（2009），《唐宋八大家文鈔》，合肥：黃山書社。
5. 【清】徐乾學等編注（2005），《御選古文淵鑒》，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6. 【清】章梈（1969），《康熙政要》，台灣：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7. 【清】張照等輯評（2005），《御選唐宋文醇》，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書籍

1. 蔡鎮楚（2005），《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
2. 蔡自新（2011），《柳宗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 陳瓊光（2004），《柳州柳學研究文集》，合肥：黃山書社。
4. 段醒民（1985），《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台北：文津出版社。
5. 方孝岳著（2006），《中國文學批評 中國散文概論》，北京：三聯書店。



6. 高海夫（1998），《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柳州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
7. 顧炎武（1996），《顧亭林文集新譯》，台北：三民書局。
8. 郭紹虞（1955），《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新文藝出版社。
9. 何書置（1994），《柳宗元研究》，長沙：岳麓書社。
10. 黃宗羲著，吳光主編（2012），《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1. 梁超然、謝漢強（1994），《國際柳宗元研究擷英·93 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2. 柳州市柳宗元學術研究會編（1993），《柳宗元研究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3. 柳宗元撰、易新鼎點校，《柳宗元集》（2000），北京：中國書店。
14. 魯迅（1981），《魯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5. 羅根澤（1984），《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羅聯添（1981），《柳宗元事跡暨資料類編》，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會。
17. 孟昭信（2006），《康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8. 施子愉（1958），《柳宗元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 孫琴安（1999），《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 孫昌武（1982），《柳宗元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1. 孫昌武（2002），《柳宗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2. 孫昌武、陳瓊光（2005），《柳宗元研究文集——第三屆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研究論文擷英》，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3. 唐富齡（1994），《明清文學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4. 王運熙、顧易生（2006），《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5. 吳孟複（2001），《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6. 吳文治（2004），《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7. 吳文治（1979），《柳宗元簡論》，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8. 吳文治（1962），《柳宗元評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9. 吳文治（2004），《柳宗元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
30. 行巖（1981），《柳文探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31.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2002），《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2. 尤信雄（1989），《桐城文派學述》，台北：文津出版社。
33. 張健（1983），《明清文學批評》，台北：國家出版社。
34. 張少康、劉三富（1995），《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5. 章士釗（2000），《柳文指要》，上海：文匯出版社。
36. 趙建章（2003），《桐城派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37.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2008），《中華大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唐文學部 三，南京：鳳凰出版社。
38. 周中明（1999），《桐城派研究》，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期刊論文

1. 鄧建（2009），〈中國古代文學“選本”之釐定與辨析〉，《理論界》，2009年11期，頁144-145。
2. 高明揚、李洪良（2012），〈清代“清真雅正”審美風尚述略〉，《山西師大學報》，2012年5月，第39卷第3期，頁90-94。
3. 陸德海（2010），〈從御選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轉變〉，《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第四期，頁84-92。
4. 孟偉（2005），〈清代敕修文章選本及其對文風建設的意義〉，《社會科學家》，2005年11月，第6期，頁28-31。
5. 孟偉（2015），〈清代古文選本的編選、評點及其文學批評意義〉，《北方論叢》，2015年第1期，頁42-47。
6. 莫山洪（2013），〈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欽州學院學報》，2013年1月，第28卷第1期，頁19-24。
7. 王兵（2010），〈論古代文學選本的批評機制和理論價值〉，《鞍山師範學院學報》，第12卷第3期，頁65-69。
8. 王亞楠 A（2011），〈《古文淵鑒》編撰理念論述〉，《語文知識》，2011年第四期，頁12-14。
9. 王亞楠（2013），〈《古文淵鑒》評點意向與影響芻論〉，《鄭州大學學報》，2013年11月，第46卷第6期，頁109-112。
10. 鄭凱歌（2014），〈論《古文淵鑒》體制“權輿于六籍”〉，《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9卷第11期，頁80-84。

## 學位論文

1. 李雲（2011），〈柳宗元山水遊記創作淵源論〉，未出版碩士論文，內蒙古師範大學，內蒙古。
2. 劉旭（2006），〈柳宗元寓言芻論〉，未出版碩士論文，東北師範大學，東北。
3. 劉文海（2015），〈柳宗元論說散文體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福建。
4. 莫軍苗（2008），〈宋代批評視野中的柳宗元〉，未出版碩士論文，廣州師範大學，廣州。
5. 師東斌（2009）〈柳宗元記文體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西北師範大學，西北。
6. 王亞楠 B（2011），〈《古文淵鑒》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鄭州大學，河南。
7. 徐麗敏（2007），〈柳宗元書啟文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福建。
8. 楊靜榮（2015），〈柳宗元傳記文學敘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雲南大學，雲南。
9. 楊再喜（2007），〈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未出版博士論文，蘇州大學，蘇州。
10. 袁青青（2014），〈《柳宗元集》墓祭文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陝西。

11. 袁茹（2005），〈柳宗元的學術研究與散文創作〉，未出版碩士論文，安徽師範大學，安徽。